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系

李 晔

JRUCWP2024033

2024. 04. 15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系

李 晔

[摘要] 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驱动力，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接受及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思想观念背景。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的演化，为外来思想观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态和实质内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及“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化不仅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紧密关联，而且阐释了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二者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实践意义。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反思，对于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以及在当今世界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阶级；中华民族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整体视野看，晚清的自强、变法、革命到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目标和动力都在于“救亡图存”，以维护民族（或种族）的生存、国家的独立与完整。“民族主义乃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关怀，也是推动各项思潮的原动力。”^①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巨变，思想观念斑驳复杂，乱象丛生，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如罗志田所言：“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② 可以推论，“各类思潮”中一定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这期间最重要和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思潮之一，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推动各项思潮的原动力”，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来说也不能例外。

对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颇丰。“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广泛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或工具，比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芮玛丽（Mary Wright）的“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驱动力”等研究。依照这种解释框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民族主义是一种持续的要素，弥漫于各种运动和意识形态之中。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共产党的创立与近代以来中华

作者：李晔，包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glhzly2003@126.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科学’与‘道德’基础研究”（18AK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沈松桥：《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269页，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

②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自序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民族反抗外在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一脉相承。石约翰（John E. Schrecker）曾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进一步原因，是它完全适合五四时代强烈的民族主义。”^① 李泽厚也有类似的说法：“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② 这些研究指出了五四时期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但也可能给人一种不恰当的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完全是由于其适应民族主义的需要，实际上是民族主义道路上救亡图存一次次的失败使得一部分先觉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名言的历史背景，就在于苏维埃革命的成功使得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成了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选项。^③ 虽然中国近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是与民族主义思想观念背景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目标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驱动力，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还需要在整个中国近现代这个更为深广的脉络中进行系统、整体性的研究，才能有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本文无意于根本解决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这个一般性问题，而意在具体阐释几个问题：总体而言，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驱动力；19世纪末从文化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为接受外来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20世纪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及“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新认识，为现代革命观念和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意味着民族主义忠诚焦点向“人民（国民、种族）”的转移；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既表现了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主权）到民族（种族）为核心的演化历程，也隐含着“以人民为中心”观念和民族利益本位的发展线索，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中超越民族主义框架，形成以人的全面需要和全面发展为主题的现代化发展框架提供思想基础。希望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阐释，探究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接受、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以及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近现代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

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充满争议的问题^④，而且也是荆棘密布的领域。这也影响到国内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

罗纳尔多·蒙克（Ronaldo Munck）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处于一种“艰难的对话”关系^⑤；唐纳德·莱文（Donald N. Levine）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诸如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⑥，表明他们明确拒绝承认无产阶级的“民族性”，因而也不可能认真对待民族主义问题。汤姆·奈恩（Tom Nairn）甚至认为“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不过他认为其他西方思想流派也没有做得更好，这一“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历史发展还没有产生出对于这样一种‘理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1914年之后这种时机才可以说成熟。^⑦ 安德

① 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18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

②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卷，96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③ 参见李晔：《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关系再认识》，载《中共党史研究》，2021（1）。

④ 20世纪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国外有过几次大的争论，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充满巨大争议。

⑤ 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Zed Books, 1986, p. 1.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41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⑦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New Left Books, 1981, p. 329 - 331.

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谈到汤姆·奈恩这一论断时说:“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而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①

按照沃克·康纳 (Walker Connor) 的解释,民族主义思想或理论将人类进行纵向的种族—民族群体划分,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群体进行横向切割的阶级划分。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是,当面临忠诚考验时,民族意识将会被证明比所有的民族内区分都更强有力,包括阶级划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是,阶级意识将会被证明更加有力,历史将会见证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胜利。^② 总的来说,他认为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意义上是不相容的。康纳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列宁也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③。

这些观点或理论似乎都在于说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相关或弱相关性。对于这类观点,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有过一种解释:“在 1914 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无论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本质是什么,它们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它们之所以反对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是无产阶级,还因为他们大都是信仰国际主义者,至少是非民族主义者。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是水火不容,两者互相排斥,非争得你死我活不可。”^④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在许多人眼中,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把民族主义看作是某种形式的虚幻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像伯林 (Isaiah Berlin) 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感情本身就是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意识形态”^⑤。欧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民族冲突看成是阶级冲突,只要人们有清楚的认识,就能摆脱民族主义的偏见和障眼物。^⑥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在相关论著中也说过:“卡尔·马克思认为,民族主义是表明人类自我疏远的暂时的反常现象……马克思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是崇拜和服从自己制造的偶像的方式。”^⑦ 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观点,不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同情或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都认为马克思反对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理论上难以协调。

实际上 1848 年之后,欧洲的形势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力量有了深入的认识,关涉民族主义问题的内容开始在他们的写作中占有越来越显著的位置。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他们开始关注东方民族国家逐渐崛起的革命民族主义力量,逐渐了解民族主义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在一些报纸文章 (比如《纽约每日论坛报》) 和晚年书信、笔记中,涉及大量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⑧ 马克思就曾认为爱尔兰的“芬尼亚运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下层阶级的运动”^⑨。在 20 世纪很长时期中,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曾被认为不仅可以实现民族革命的任务,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②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

③ 《列宁全集》第 24 卷,136 页,人民出版社,2017。

④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1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⑤ 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404 页,译林出版社,2002。

⑥ 参见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102—10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⑦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⑧ 参见凯文·安德森:《边缘地带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族群和非西方社会》(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尤其是马克思一些报纸文章和晚年笔记、书信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共产党宣言》时期相比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对北美、印度、中国等非西方社会民族主义斗争的相关论述。

⑨ 原文为:“芬尼亚运动的特点:社会主义的运动,下层阶级的运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504 页,人民出版社,1998。

而且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有大量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他们并没有对民族主义进行明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的具体形式和表现进行阐述的。比如在《论波兰》及《德国对外政策》中对日耳曼主义、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对泛斯拉夫主义、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沙文主义等等的批判。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以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德国民族性”的批判，实际上也已开始对具体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的批判。

《共产党宣言》中被认为有比较集中的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恩格斯在1893年为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①，当时正好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②从这些用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或者说“国家民族”。他们说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这里“农民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是一种更广义的用法，分别指属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民族。“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代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④这里“统一的民族”所指的就是“民族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后者的进步，但只是用新的民族压迫代替旧的压迫，用新的民族矛盾代替了旧的民族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消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行各民族真正的联合，通向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因为“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⑤。因此，任何性质的民族主义革命，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根本目标，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也是最终解决民族矛盾的基础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指出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密切关系，民族剥削和压迫是阶级压迫的反映，民族剥削和压迫的解决最终取决于阶级矛盾的解决。“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⑥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人类历史和民族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直面“民族”及“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问题，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民族革命实现“民族”独立自主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最终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因此从中也可以推出，民族主义不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在最终意义上，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出路在于超越民族界限的“非民族主义”道路。

从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以及20世纪下半叶之后第三世界民族运动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在历史发展中需要经过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因为没有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⑦

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探索历程说明，无产阶级只有在领导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程，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和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无疑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的。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

①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7、396、405、405、413、419、419页，人民出版社，2012。

程中得以实践,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自觉认识到这一问题,也不完全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适应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因而得以传播发展。实际上,正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历史任务及其发展演化的客观历史现实,或者说民族主义道路的失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接受,正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实现民族平等自由和繁荣富强的现实历史进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辩证关系。

二、近现代民族主义观念演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接受观念前提

西方学界有不少人认为前现代中国人所认同的是文化和历史传统,这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与民族主义不相干。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古代中国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的认同,“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①,进而认为“这种奠基于共同传统与共同象征系统的文化主义,与植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民族主义,可谓风马牛不相及”^②。但另一方面,更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由来已久,例如章太炎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③孙中山指出:“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④王尔敏认为:“中国人之怀有民族主义思想,就历史渊源,可以上推至先秦,甚至更早。在长期传衍中的意义,包含了族类的自我确立和文化的自我确立。这两个重要特质,三千年来一直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⑤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相互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⑥。

即使在前现代中国有无民族主义问题上存有争议,但基本没有争议的是都承认中国前现代已有“族类”区分意识。比如《左传·成公四年》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礼记》中“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荀子》中“先祖者,类之本也”等,可以看作已经表现出种界群类区别的观念。最显著的就是诸夏与夷狄的分辨,如《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中“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些表述有的看起来似乎带有强烈的同一血统宗族观念,但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人对“族类”的看法,重点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和道德,比如孔子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滕文公》中“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就充分代表了文化区分意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肯定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大原则。秦汉时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民族认同符号已超越了种族、语言和政治组织实体,此后儒家又把道德伦理价值作为某种认同符号,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被理解成由道德教化形成的世界秩序,所以这种族类意识被称为文化主义。这种族类意识把自己的伦常、制度和文化作为最高道德价值,因此在其所表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民族则按照其道德教化程度被分成“夷”“蛮”和“藩”。这种具有优越感的以文化、道德认同为核心的心态和族类观念很难接受外来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制度及其核心价值理

① 许纪霖:《反西方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42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② 张晨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7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③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4页,中华书局,1977。

④ 《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⑤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⑥ 吕思勉:《中国通史》,3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念。中国古代曾经历过数次民族危机，但几乎都没有遭遇文化危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以文化优越感为基础来应对这些危机，形成一种文化优越感与民族救亡爱国情结相统一的传统，更使这种文化主义具有深厚历史积淀，难以逾越。

促使这种传统族类意识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近代以来西方入侵引起的民族危机伴随着原有文化不能克服危机的文化危机意识。魏源的《海国图志》可以说在地理观上突破了华夏中心主义，也标志着传统民族认同符号出现了危机。这种认识上的进步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只有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并且在具有高度发达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自我优越感的华夷观念，才有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平等意识。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上清帝书中说到，当今之中国“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①。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他在奏折中直接说：“今为列国竞长之时，则必以列国竞长之法治之，而不参以分毫大一统之旧。”^②进入晚清以后，正是在现实的民族危机面前，在和西方列强的对抗和交流中，“中华”逐渐成为一个包含国家主权、地域、族类和文化共同体认同的综合概念，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形成。梁启超最早使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一词，他于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③在《新民说》中他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主义的含义：“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④这里既是对“民族主义”的阐释，其实也是对民族国家的阐释。

虽然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一些先进的读书人和官员开始探索强盛国家、壮大国威和抵御外来侵略的道路，但中国人是在甲午后才真正开始思考“国家”问题。随着甲午战败而来的严重危机氛围中，如果说保教、保种、保国分别意味着文化、族类、主权观念觉醒，这时民族、国家的续存与保持原有的文化核心已出现分裂，并转向以实体民族与国家为中心。正像史华慈所说：“这里所表明的思想观念无疑发生了基本转变。对于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价值观、制度、风俗、思想，必须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即它是否维护和加强民族的国家。”^⑤其中实质性问题就是民族国家存续在价值优先性上超越了保持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更鲜明地体现于中国近代思想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变。在天下观中，文化价值是核心，由此体现族类意识和优越感；在国家观建立中，民族意识与政治国家结合，从文化性族类区分转向实体性民族国家意识。在文化民族主义观念占主导地位时，就不可能接受外来文化的核心观念，只有民族主义关怀转向实体性民族及与国家结合，在国家观念冲击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存亡绝续，这才为关注和接受西方文化和制度提供了前提。

通常我们耳熟能详的对近代史的概括是从学西方科技，到学习制度，再到学西方思想文化这样一个渐进过程。这种论说没有触及近代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问题，而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想观念转变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社会历史变革的思想前提或观念基础演化历程，就是民族主义忠诚焦点从文化到国家（王朝）再到民族（种族）存续的渐变过程。在文化民族主义阶段，表现出华夏中心主义心态，认为富强的前提是文化核心不能变，“中体西用”是其代表，中国的文化制度被视作某种认同符号，民族主义就表现在忠诚、维护传统的文化和制度。1895年之后，维护固有的传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22页，中华书局，1981。

②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36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0页，中华书局，2015。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页，中华书局，2015。

⑤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46页，中信出版集团，2016。

统文化和制度不能使中国强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看法，它也就再难以成为民族忠诚的对象了，这时忠诚的对象转向国家，但这时的“国家”与“王朝”还未加区分。

我们说这一时期发生的从以文化主义为主导进入国家主义占主导，主要是适应“民族国家”的世界潮流和现代世界秩序，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引起的转变。这种“适应”具有无奈选择的一面，也具有适应或转向现代世界格局的一面。当然所谓转向国家主义并不是就放弃传统文化，只是说思维重心发生了转移而已，并且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历史传承，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牢固基础。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①在此论述中，国家的基础在于相同的民族，民族的根底则在于文化。

晚清最后十年，以“国家”和“国民”为重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得以凸显。到辛亥革命前后，国家忠诚与清王朝逐渐分离，转向与民族忠诚的结合，化“臣民”为“国民”，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梁启超撰文《新民说》，1902年2月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开始宣扬新的“国民”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国民”的想象是在“自存”“自强”“自立”寻求中认识到必须强调国人的主体性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视“国民”为国家主体。这表现出当时已经认识到寻求国家认同的目标需要使国人从传统臣民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才能实现。

而辛亥后知识分子普遍对国家和现实政治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使他们对“国家”和“国家主义”进行反思，“国家”进一步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胡适在1917年《藏晖室札记》中写道：“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②。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提出，“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③，并在《随感录七八：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一文中表达了对国家的厌弃、对国家观念的批判。^④这一时期李大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关注“富强”与“复兴”。他的“复兴”观与民粹主义密切关联，并没有把民生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而是把人民群众看作一个统一体，国家反被看成对人民天然的社会生活的持续威胁。这种“人民”与“国家”对立的思想以及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当时中国具体社会背景的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伴随着关注焦点和忠诚对象从“国”向“民族”的演化。

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一方面从文化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这为接受外来思想观念及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已开始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王朝、政府不再是国家忠诚焦点，这为新的“革命”观念形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前提。这又意味着关注焦点和忠诚对象从“国”向“民族”转移，其中对民族的理解或民族观念成为核心问题，可以从“民族”概念的理解及“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作为线索来探究其发展轨迹。

三、“民族”及“中华民族”观念发展及其“共同体”基础

民族主义思想演化直接影响近现代汉语“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及其内涵演化。汉语“民族主义”概念借自日语 minzokushugi，这个日语词字面上也意指“种族主义”，同时，从日本转道的西方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民族观念影响较大，“民族”一词进入中国之初被大多数人理解为一种以种族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带来单一民族国家观念。

古代汉语里“民族”一词不常见，比如《南齐书》中“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唐人李荃

① 吕思勉：《中国通史》，3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② 胡适：《藏晖室札记》，43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

③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载《新青年》，第五卷第2号，1918-08-15。

④ 陈独秀：《随感录七八：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载《新青年》，第七卷第2号，1920-01-01。

《太白阴经》序中“倾宗社、灭民族”。但在这些文献中“民族”多用来表示“民之族属”和“民之族类”的一般分类含义，主要指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与近代意义上的“族类”或“宗族”相当，并不能与某个具体民族连结起来组成“某某民族”的词汇，与现代西方“民族”一词的含义并不相同。^① 现代汉语中“民族”一词来自日本汉字新词对译西文的用法，普遍认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最早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从而将日语把西语 nation 译为“民族”这一用法输入汉语，其含义同时兼备了构成国家的“国民”这一西欧政治学的意义和炎黄子孙这一个种族是共有相同血脉的宗族的意思。日本学者松本真澄认为日语与汉语的“民族”都可以表述为“民”“族”，尤其侧重于“族”，都强调血缘连续性的意义。^②

随着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汉语语境中现代“民族”概念广泛使用，“民族”的这种血缘、宗族意义也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1895年，严复在《直报》发表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文章，在其进化的世界观念中，文化被抛弃了，种族成为确定集团成员身份的标准。他认为清政府版图内都是黄种人，亡国灭种危险来自外部“白种”的竞争，因而反对排满。从严复开始，不论在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那里，“民族”实质上转变为蕴含着生物性种族意涵的概念，主要从“种”的生物学角度来解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问题。康有为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浓厚影响，认为“中国只是黄种之国”，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再比如章炳麟重新建构的华夷秩序不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种族方面的，认为够得上“中华之民”资格的只有“汉种”。就“中国”这个术语的传统意义来看，本来有地理上、文化上、种族上三种含义，其中文化意义尤为重要，近代以来，种族性“中国”的内涵（中国作为一个种族共同体）甚至超越了地理上和文化的“中国”，并且与新的现代“国家”观念结合，在20世纪早期成为“中国”概念的首要含义。

梁启超1899年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里说：“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③ 他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国民族”概念，这一概念有时指汉族，有时作为中国各民族总称。1902年4月，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连载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民族，在1922年写成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又用“中华族”指汉族。

不过，各民族平等融合为一大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在清末已出现，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受到日本人翻译的伯伦知理《国法泛论》的影响，也有了不同血统、但只要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即属于一个共同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思想。他在190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分别使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前者仍指汉民族，后者更加接近后来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他还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形成历史。

孙中山在致力于排满革命中也是用“中华民族”来指称汉族，主张建立汉族人的国家，但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④，提出“五族共和”，主张建立多民族国家，将“中华民族”扩充为各民族的总称。1924年经孙中山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清楚表述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但同年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讲到民族主义部分时，又说过“民族就是国族”，“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又带有单一民族国家观念色彩，所以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是复杂而变化的。

①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51—5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②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119—120页，民族出版社，2003。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54页，中华书局，2015。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2页，中华书局，1982。

随着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每个人在法律上成为“平等”的公民。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毛泽东在1919年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①，从而表明了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立场。

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还没有明确固定下来，例如赖希如1935年发表的《中华民族论》一文认为“中华民族”一词，“就狭义说，当然指的是中国境内民族的主体汉族……复就广义说，中华民族是统指境内诸民族的全体而言……”^②。不过总体而言，五四运动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中国的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口号的明确提出、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运动，在实践层面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人整体的大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从“自在”模糊感知转化为具有“自觉”意识的明确认同。傅斯年1935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③ 顾颉刚1937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强调“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④。顾颉刚1939年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⑤

黄兴涛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在具体内涵上还存在差异，但没有疑问的是，大体上都认同了中国各族人民结合而成的整体具有一种全方位的一体性，不仅拥有共同的现代国家的国民身份及其所辖的生息地域，拥有着各种亲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同时还拥有着共同的民族命运和民族前途，而这些也正是中国各民族一体性之现代观念得以发展和传播的重要社会基础和认知前提。^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发展演化趋势中也有否定中国多民族存在、主张民族融合的“一个民族”倾向性，这种倾向在蒋介石国民党那里突出反映出来。这一问题在后文再展开论述。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以“文化”为忠诚焦点时，难以维新变法，因为政治制度作为文化一部分仍然是民族主义忠诚的焦点；只有从文化主义转变到国家民族主义，才可能进行维新变法，改良政治制度；又因为这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还将国家与王朝、政府相同，因而又不可能发生革命。现在，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以中华民族为重心，民族主义忠诚的焦点转移到作为种族的民族上来，就可能为民族（种族）存亡及强盛而推翻现有政权，因而上述也许看似不甚相关的中国近代“民族”与“民族主义”观念演化历史过程，实质上正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及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这其中隐含着民族主义关注焦点从“文化”“国家（主权）”到“民族（或种族）”这样一条重心转移线索，这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结合和中共革命实践奠定了重要思想观念基础，也为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超越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观念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历史条件。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汉语语境中“民族”与“国民”在概念上难以明确区分，但也有一种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湘江评论》第4号，1919-08-0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393-394页，湖南出版社，1990。

② 转引自张晨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207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③ 《傅斯年全集》第4卷，12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④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载《申报》，1937-01-10。

⑤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1939-02-27。

⑥ 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163-16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粗略的观念转变痕迹。严复在 1895 年提出建立一个合适的民主国家的结构是培育忠诚爱国的人民的先决条件；梁启超 1899 年开始强调“国民”这个词，用来设想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互相构成关系，他认识到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中，国家和人民之间具有互相依赖的构成性关系；1898 年后，关于国家和人民关系的更激进的理解，“人民”作为潜在地先于国家存在的民族范畴出现了。也就是说，在短暂的时间内，思想重心经历了从“国家”优先于并建构“人民”，到“国家”与“人民”互相构成，再到“人民”优先于并建构“国家”（这里“人民”是作为“民族”意义上出现的）。此后，民族主义演化基本就以这一“民族”重心展开了。当时，“国家—人民”关系已成为知识界争论的一个中心主题，这可以从当时对“波兰”这个概念使用的转折反映出来。知识界一开始关注波兰是作为“亡国”的例子，作为中国亡国的警示，后来是作为“当代人民斗争的所在地”将波兰“人民（民族）”作为反帝斗争的模板来赞颂的。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对“波兰”的定义发生了从“国家”到“民族”的转变，将“民族（人民）”与“国家”区分开来，并将思想重心从“国家”转向“民族（人民）”。^①而其中又隐含着“压迫”与“被压迫”民族这样的“阶级”划分色彩。1898—1911 年间吸引中国人注意的菲律宾、夏威夷、古巴反抗西班牙和美国，南美布尔人反抗英国，越南反抗法国，波兰、埃及、土耳其反抗领土分割等“民族”斗争，以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日本向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北扩张等，都以殖民化、帝国主义化世界为背景，带有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区分的“阶级性”观念。

这种世界性视野将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运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使国人对民族独立自由的理解超越了一国一族的局限，更可能理解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需要超越民族主义的目标及道路才能达成，为能够将民族独立自主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展奠定了基础。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观念也使得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这种显著“阶级性”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带来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是一种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情感。这也是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例如对于李大钊来说，布尔什维克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面对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释。以前，他曾孤立地关注中国的命运，之后，他把国际资本主义看作是罪魁，把中国人民的未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联系在一起。^②

“人民”这一概念在针对外来民族压迫意义上与“民族”基本同一，但它可以在世界范围把不同国家所有被压迫民族都集结在“人民”的旗下，从而便于与政权、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相区分，比如上面提到的对“波兰人民”的理解；又可以在国家内部避免为强调共同体意识而走向“单一”民族带来的问题。同时，“民族”是一个各阶级、各阶层综合概念，而“人民”一方面可以超越各国之间“民族”界限，另一方面又可对各民族内进行“阶级”意义上的进一步区分。这使得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人民”的内涵和外延随之变化，使革命和历史发展的主体与主题得以明确。

四、“阶级”与“民族”关系的认识及“人民”根本地位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历了“阶级”与“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体现了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宗旨的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革命实践结合，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代表。

1922 年中共“二大”宣言公开提出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任务。^③

^① 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4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5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128—12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月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宣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① 这看起来好像将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统一整体，但这种把民族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类的“民族革命”观念，是与当时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论直接相关联的，也与近代中国对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南非等“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关注形成的世界革命舞台这一视域相关。

192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用“国民革命”替代中共二大所提出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的话语体系更适合当时各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的诉求。20世纪初国人所理解的“国民”相当于“国家子民”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全民”的意思。在国民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也有很多关于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不过当时所说的阶级压迫，主要特指列强、军阀在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对中国的压迫，这种阶级压迫实际上指的是民族压迫。关于这一时期的国内外研究者基本公认，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之下，国民革命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主要指与别的国家民族之争的压迫与被压迫斗争，“阶级”观念服务于“民族”的国民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表述中基本用“大革命”替代了“国民革命”，由此直到1937年前，“阶级”从“国民革命”的从属性概念逐渐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民族内阶级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不断强调、凸显，革命被解释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被视为革命的直接动因。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开始突出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1935年8月《中国苏维埃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呼吁为了拯救中国，不分党派、团体、军队，所有的爱国者结成统一战线。宣言中使用的“大中华民族”包括各族群在内的所有居住于中国境内的人，除了卖国贼以外。按照松本真澄的说法，“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国民党的理论家，在中国与外部势力对峙之时，必定提倡的中华民族所谓‘种’的救亡思想，被写入了要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中，由此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摆脱了只包括无产者的民族的形成的抽象领域，从而成为更加能打动人们心弦的理论”^②。

“八一宣言”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意识”的重要转折标记，提出包括全体中国人广泛性的“大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③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④ 这标志着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核心思想的确立。

“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所反映出的一个转变是从代表无产阶级到代表中华民族。比如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1936年10月10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等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宣布，“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⑤ 这里虽然使用了“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这种带有阶级特征的概念，但已将民族作为整体概念，而不再强调无产阶级民族。但有研究者也指出其中将“中华民族”与苏联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并列，因而认为这里“中华民族”主要指的还是

① 《本报宣言》，载《向导》第1期，1922-09-13。参见《向导》汇刊第1集，1-2页，向导周报社，1924。

②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193页，民族出版社，2003。

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267和264、540和5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318-3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汉族，只不过不再是汉无产阶级，而是汉“种”整体。比如松本真澄认为，1936年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汉无产阶级而且将包括所有阶层的汉民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这一立场鲜明化的一年。但松本真澄的研究过于突出中华民族观念中的汉种族色彩，其实1936年之后中共就将“中华民族”进一步扩张为中国所有族群了。正如历史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增强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主权观念，20世纪日本对中国侵略也加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整体意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氛围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中国国内的所有族群就是“中华民族”这一观点。

黄兴涛指出：“可以说1936年以后，在中共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一词作为表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或者说作为表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社会文化层面之中国人的总体概念，其使用已经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尽管偶尔也还会有指代汉族的使用）……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转变本身，中共当时似乎并没有很清楚的自我意识……有些代表人物还声称‘中华民族’一词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之意。”^①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当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与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时，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要求“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②。在党的后续文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种族和民族现在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及“神圣的自卫民族战争”等表述，民族统一替代了阶级裂痕，反复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代替之前广泛使用的“劳苦大众”。

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论述了“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使用了大量“中华民族”概念，清楚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思，论述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时，阐述了这里“民族的”意思是“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③。可以说，到这一时期，虽然突出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与外来侵略民族相对立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意义，也就是基本等同于“全体中国人”，但对于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未得到非常明确的强调。

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演讲中说：“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④ 蒋介石1943年在《中国之命运》一书初版中，将五个宗族扩充到“多数宗族”：“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⑤ 1944年增订版中进一步表述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我们的各宗族，实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一个种族。”^⑥ 就在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初版发行几个月后，中国共产党随之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蒋介石这种中国境内各民族“同源论”和“融合论”的“单一民族论”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由陈伯达所写、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蒋介石的“国族”观是法西斯主义血统论，只承认一个民族，因而是捏造单一民族论、否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⑦ 在对蒋介石的批判

①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340-34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3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706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④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参见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21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⑤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2页，正中书局，1943。

⑥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增订版，2、9页，正中书局，1944。

⑦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载《解放日报》，1943-07-21。

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总称的观念。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①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使用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就是“组织与团结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②其中使用的是“中国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里不知是否为了有别于并反对国民党及蒋介石对“中华民族”使用中所突出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确实突出了各民族平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正确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前文论述所显示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一直到全面抗战期间，不论是将各民族无产阶级还是将各民族各阶层作为完成革命的主体承担者，或者不论是从世界革命理论还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主线都是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随着社会与政治甚至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随着对完成民族独立与解放目标的认识的变化，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和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主体力量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境况中发展所展现出“阶级”与“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转变，以及“中华民族”概念的阶级性与民族性含义的不同演化过程，可以看作是围绕“民族”与“阶级”这一核心关系，具体地回应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关性这一时代课题。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早期“阶级”与“民族”革命不同阶段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根本代表的确立，最终着眼于“人民”根本利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落脚点，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关系，但更重要的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领导并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经过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自觉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其中从隐到显的主线是“人民”这一核心理念。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凝聚全体中国人民，中共曾组织祭拜黄帝陵，组织历史学家利用当时重大考古发现，从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历史来论证中国境内各族群为同根共祖、血脉相联的一大中华民族。这一方面是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的现实需要，只要是符合民族生存需要的文化资源都被汇集起来，只要对抗战有利，就汇合到一条战线上来。但另一方面，之所以使用这种论证方式，这种形式能够行之有效，在于传统族类、宗族、泛血缘观念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这种影响也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段时期官方对“出身”“成分”的强调，以及普遍而长久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等大众民族认同观念。

诉诸血缘和共同祖先传说及人类始祖的民族主义建构方式，虽然在中国仍具有一定思想传统基础和情感影响力，但在现代世界中也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困难，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基础关键在于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理念的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始终如一的追求，因此具有最广泛的认同基础，也要求摆脱深受泛血缘宗族观念为基础的传统“民族”观念，而转向以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及核心价值为基础的、以“人民”为忠诚对象的理念。这就是现代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认同与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目标的统一，既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民族（种族）到中华民族认同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对民族主义的超拔和升华。争取民族生存与复兴从长远来说要指向现代化方向，最终落在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从根本上来说，是摆脱传统民族主义的基础框架，跳出民族主义藩篱，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意蕴，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根本目标。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083-1084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5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历史演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关系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奋斗历程中发挥了强大的驱动力作用，其内涵及形态演化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相互激荡，逐渐形成以中华民族为忠诚对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奋斗实践。但同时也说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各种形态都不能解决拯救民族危亡、走向民族独立富强的问题，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中国近现代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转变并引领了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以及近现代革命的方向，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因素。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演化历程，其忠诚焦点从“文化”“国家”到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民”，既是寻求富强道路探索的思想观念转变历程，也是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发展的历史基础。

中国近现代历史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借用、吸纳和批判，也说明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目标不能依靠民族主义道路来实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近现代中华民族寻求救亡、独立、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的崭新道路而突显并发扬光大，那么在新时代，将理论和实践主题推进到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正是超越民族主义藩篱的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本义所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在民族救亡的历史任务完成后，就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历史时期，走向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目标的时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转向人民幸福、自由、平等，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富强追求，也不再仅是争民族独立与平等，根本上在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更在于对人类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理论反思，对于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以及在当今世界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Marxism in Modern China

LI Ye

(School of Marxism,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Nationalism has been the motive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it form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Marxism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PC.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ism in connotations and types during modern China has made up the conceptual prerequisite for the acceptance of foreign thoughts, especially of Marxism, also influenced the manifestation and essential contents of Chinese Marxism. Not only the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Marxism have the revolution history of CPC an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vealed, but also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utual agitations and influences between both of them in the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ssu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ese context can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core idea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for correctly viewing and handling the issues today.

Key words: Nationalism; Marxism; Nation; Class; the Chinese Nation